

黃庭堅詩論和詩風的政治特色探究*

杜若鴻**

摘要：本文考察江西詩人群的代表人物黃庭堅，探究其詩論和詩風的政治內涵。文章指出，作為一位典型的儒士型、政治型的詩人，其詩歌涉及範圍甚廣，內政外交皆有識見，批評王安石新法亦能切中要害，對新法的諷諫，偶呈激越不平的情緒。烏台詩案至被貶黔州前，乃其詩風轉變的緩衝期，其詩風已呈奇崛瘦硬，用字用句朝著「無一字無來歷」的方向進展，散文化特色消退，呈深晦的特色，詩寫得崛硬但並不激怒。由於好用典故，不易解讀，其直接論政的力度有所減弱。而隨著黨爭的加劇，黃庭堅晚年對政治呈冷感狀態，政治變化成為詩風轉向的一個原因。其後期詩歌主題變得極少正面直涉政治，於詩藝上則更專注於詩法的探討，詩歌主要用以自抒性情來排遣情懷。

關鍵詞：黃庭堅 諷諫 奇崛 詩法 自抒性情

一. 引言

江西詩人群體是一個以追求詩藝著稱的創作群，成員大多為江西籍。政治上他們反對新法，具有立場鮮明的特徵。這個詩人群體中，朝野人士俱有，可傳者計有二十餘人。¹ 總體上，江西詩人群比蘇門詩人群和新黨詩人群表現出更自覺的詩技追求意識，寫詩者雖多，但政治詩的總創作量卻少。當中以黃庭堅的政治詩數量最為突出，其次是陳師道和較集中在宋室南渡後的陳與義、呂本中等。本文考察這個群體的代表詩人黃庭堅，探究其詩論和詩風的政治內涵。

二. 抱道而居：承祧風騷大旨

黃庭堅〈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一文比較集中地表達了他對詩歌性質及詩歌功能的見解：

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

* 本文據哲學博士論文修訂，發表於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 杜若鴻，香港 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講師。

1. 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俛、林敏功、潘大觀、何顛、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參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載胡仔：《漁隱叢話·前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0冊），卷48，頁3。

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幹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²

黃庭堅認為詩是性情之物，熙寧變法以來，詩歌成為政爭的工具之一，「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尤以蘇軾的詩，黃庭堅認為其天賦才情，令人欽佩，曾作有詩，詩題〈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贊蘇軾的詩藝云：

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
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
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
.....³

又將蘇軾較諸歷代名士如司馬相如、揚雄等，〈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有句云：

儒林丈人有蘇公，相如子雲再生蜀。
往時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⁴

但是亦同時指出蘇軾「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⁵不客氣地指出，其怒鄰罵坐，要非本色。認為詩者，需「忠信篤敬，抱道而居」，發揮其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使「聞者亦有所勸勉」。詩人罹禍，乃因為失去「詩之旨」。從這一點而言，又見黃庭堅的詩學觀點具有承續儒家詩教觀的色彩。這一詩學觀，亦帶出一個重要訊息，即黃庭堅對詩歌的政治內涵和作詩者的情操是頗重視的，非只是耽游於詩藝的純粹詩人，而是和歐、蘇等人一樣，亦一典型的儒士型、政治型詩人，只是論政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學詩的對象，誠如吳淑鈿指出，「宋詩大家都是不例外地轉益多師而自成一家。自王安石起，宋人最大張旗鼓去學習的，當然是杜甫，江西詩派甚至可視為學杜的潮流。」⁶對於杜甫詩，黃庭堅確實推崇備至，圍繞其詩歌政治內涵的論述頗多，見〈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

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軟斜。
帝閭悠邈開關鍵，虎穴深沈探爪牙。
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

2.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卷25，頁666。

3.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冊，卷5，頁191-192。

4.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1冊，卷8，頁287-288。

5.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答洪駒父書〉，頁474。

6. 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二章第二節，頁24。

潛知有意升堂室，獨抱遺編校舛差。⁷

所謂「國風純正」云云，對其雅正之風特別看重，而對於其「百年忠義」，顯然也是站在儒家的立場看杜甫的人格修養，又其「千古是非存史筆」云云，則點出杜詩具有政治內涵的「詩史」特色。「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⁸ 正指出杜甫不忘君恩的憂國情懷。此可見黃庭堅的承祧杜詩，又非唯以詩法而言。

又〈老杜浣花溪圖引〉云：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為青。
碧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
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
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
千戈崢嶸暗宇縣，杜陵韋曲無鷄犬。
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飄零不相見。
此公樂易真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
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
浣花酒船散車騎，野牆無主看桃李。
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
願聞解鞍脫兜鍪，老儒不用千戶侯。
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
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
兒呼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作。
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⁹

同樣是一篇對杜甫充滿禮贊的詩作。詩也是從國風的的角度來評論杜詩，講述杜甫流落錦官城之際，依然抱有「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的胸懷，突出杜甫並不為自己一時安定而忘卻天下，「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句，指出杜甫始終表現出憂國憂民的情懷。只是「忠義」空剩下寂寞，報國無門。

對於杜甫詩在北宋中後期備受推崇，可進一步從政治方面找到解釋，這裏略加引論。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重要詩人對杜甫推崇備至，而「杜甫現象」在北宋中後期正可視為宋代詩人對詩歌內涵的更明確要求，可視為詩文革新運動後，北宋詩人認為詩歌應該表達儒家政教觀的最佳注腳。

關於杜詩的詩史內涵，學者多有論述。¹⁰ 從政治角度看，對杜甫的推崇在北宋亦是

7.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5冊，補卷4，頁1706。

8. 《潘子真詩話》引黃庭堅語，見郭紹虞（1893-1984）：《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10。

9.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4冊，卷16，頁1341-1343。

10. 參楊義（1946-）：《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頁475-546。

一種「詩歌——政治」現象，說明在詩文革新後對杜甫的接受程度緊跟韓愈之後，從中可見北宋中期詩歌追求的一個側重點。

綜觀杜甫的詩，其憂國憂民的政治關懷體現無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一飯不忘君恩」的忠君之情，正是其感動北宋詩人的核心原因。蘇軾評曰：「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¹¹ 王安石作詩〈杜甫畫像〉贊曰：「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¹² 他在選杜、評杜與仿杜方面，成績突出，¹³ 是造成北宋中後期杜詩地位驟升的關鍵人物。誠如當代學者所指出：「宋人對杜詩藝術的高度推揚則越來越趨於一致，類似承前啟後、總萃諸家、集大成的評價使杜詩真正成為唐詩的最經典範式。」¹⁴ 回視杜甫詩作，其最感人的詩篇幾乎無不是在憂患意識中鑄成。〈兵車行〉、〈三吏〉、〈三別〉、〈春望〉等等，所表現出來的政治關懷意識和宋型詩人有其異代共鳴的效力。而杜甫表現出忘懷個人得失的偉大胸襟，這在北宋中後期廣泛引起詩人的共鳴也並非出於偶然。

清人田雯所云極是：「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杜、韓海內俎豆久矣。梅、歐、王、蘇、黃、陳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¹⁵ 杜詩（韓詩）沾溉宋代詩壇，其中政治內涵淵源亦深矣。

黃庭堅〈大雅堂記〉載：

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之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¹⁶

紹聖初年，黃庭堅被新黨以「修史多誣」的罪名，貶移黔州安置。此時，黃庭堅政治上受過挫折，促使他轉而更關心詩歌的技法（見〈答洪駒父書〉）：「老夫紹聖以前，不知

11.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0，〈王定國詩集敘〉，頁318。
12. 王安石著，李壁注，李之亮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卷13，頁237。
13. 參王晉光：〈隔代追慕：選杜、評杜與仿杜〉，載《王安石八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
14. 參谷曙光：〈藝術津梁與終極目標——韓愈作為宋人學杜的藝術中介作用〉，《杜甫研究學刊》，總第83期（2005年1期），頁35-36。
15. 田雯：《古歡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4冊），卷16，頁6；又參趙翼：《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云：「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卷5，頁56。
16.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6，頁437-438。

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這和蘇軾由嘻笑怒罵到絕口不談新政的巨大轉變有所不同，在紹聖前黃庭堅對於詩歌風格的看法屬溫柔敦厚一脈，歷經烏台詩案的有驚無險和修史罹禍後，更堅定了這看法。他指出，自從杜甫以來，四百年間斯文委地，「大雅之音」不傳，「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堂者」。其觀點不盡中肯客觀，抹殺了如王、范、歐公等人的業績，但從側面可得知黃庭堅所追求的詩歌風貌，亦可得知「杜甫現象」的熾熱和黃庭堅的推崇是分不開的。而從其立意，始終圍繞「《國風》、《雅》、《頌》」闡發，認為非深曉風騷之學是難體會杜詩的「大旨」的。世人學杜詩不得其法，「取其發興」，專注其詩藝，殊不知「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而正因為無意而意自至。也就是說，杜詩的高處在於內涵(包括政治等方面)和藝術技巧達到高度的統一，並非純粹以雕琢為能事。

三. 動而中律：平穩而乏強諫

回到黃庭堅的詩論。關於諷諫問題，黃庭堅所排斥的是「強諫」，不怨不怒的諷諫，只要符合詩歌要求的「雅正」即可。因為崇尚不怨不怒的詩風，故他對詩人本身也有所要求，其〈胡宗元詩集序〉謂：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泉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托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唯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¹⁷

據此文獻，得知黃庭堅認為，創作主體即使懷才不遇，寄情於詩也不應怨天尤人。他認為那些怨鳴的詩只是「末世詩人之言」，把得失看得太重。一位有涵養的詩人，應該像金石絲竹那樣，「動而中律」，具有優雅的從容風度，符合儒家溫柔含蓄的旨趣。這一點，和他不主張強諫的追求也是一致的。對於當時「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的情況不敢苟同，又可見其對詩之「有為而作」的重視，非唯宣洩個人喜怒而已。

黃庭堅在變法問題上，和司馬光等舊黨觀點一致，持保守態度，對新法能以事論事，不挾意氣；其詩風所呈現的積極當下精神如同王禹偁、范仲淹等詩人；但相較於蘇軾論政詩而言，其詩風在中前期已顯露出相對平穩而乏「強諫」的特色。

黃庭堅在踏入仕途之初，敢於批評和議論時事，而且詩風流暢明白，散文化突出，

17.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5，頁410。

這和經歷仕途挫折後專注於詩法有所不同。試見其〈流民歎〉：

朔方頻年無好雨，五種不入虛春秋。
邇來後土中夜震，有似巨鼇復戴三山遊。
傾牆摧棟壓老弱，冤聲未定隨洪流。
地文劃剝水膏沸，十戶八九生魚頭。
稍聞澶淵渡河日數萬，河北不知虛幾州。
累累繼負襄葉間，問舍無所耕無牛。
初來猶自得曠土。嗟爾後至將何怙。
刺史守令真分憂，明詔哀痛如父母。
廟堂已用伊呂徒，何時眼前見安堵。
疏遠之謀未易陳，市上三言或成虎。
禍災流行固無時，堯湯水旱人不知。
桓侯之疾初無證，扁鵲入秦始治病。
投膠盈掬俟河清，一簞豈能續民命。
雖然猶願及此春，略講周公十二政。
風生群口方出奇，老生常談幸聽之。¹⁸

此詩寫於熙寧二年（1069），當時黃庭堅年方三十五，任汝州葉縣尉。詩中陳述對天災與政事的看法。針對王安石認為「天變不足畏」的言論，黃庭堅認為天道雖不可知，但是對政事是具有昭示意義的，人們應順應自然之道。據《宋史》¹⁹ 載，熙寧元年（1068），水災、地震連連，京師更是數度地震，百姓流離失所。詩始以描寫旱災情景，繪影繪聲，歷歷在目；接著指出災情告急，閒田未足供給種植，希望君主明詔，祈福消災；同時指出，天災亦繫乎人事，其中所用「桓侯」典故，意謂關鍵在於用人得法，並指出新法的其中一項不足在於「以鐵龍爪治河」。

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以《周禮》為據，頒佈天下，獨行己志，黃庭堅勸導為政者應多聽忠言，方能為天下蒼生謀得真正的福祉。此詩指陳時弊，用字用句不事雕琢，文從字順，而且意思明確，容易明白，是黃庭堅典型的前期詩作。

又見其〈對酒歌答謝公靜〉一詩，節錄如下：

我為北海飲，君作東武吟。
看君平生用意處，瀟灑定自知人心。
南陽城邊雪三日，愁陰不能分皂白。
摧輪踈蹄泥數尺，城門晝閉眠賈客。
移人僵屍在旦夕，誰能忍饑待食麥。

18.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1，頁765-766。

19. 參脫脫：《宋史·神宗本紀》，第2冊，卷14，頁268-270。

身憂天下自有人，寒士何者愁填臆。
民生正自不願材，可乘以車可鞭策。
君不見海南水沉紫栴檀，碎身百煉金博山。
豈如不蒙斧斤賞，老大絕崖霜雪間。
投身有用禍所集，何況四達之衢井先汲。²⁰

此詩寫於元豐元年（1078），當時王安石新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這首詩批評均輸法對百姓生活造成困擾。熙寧二年（1069）七月，為了增加國庫積蓄及避免商人屯積居奇，新法始在淮、浙、江、湖等六路設置轉運使，按「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處理地方上供的貨品。此項新法原意本好，既可省勞運之費，又可減輕人民受到剝削。但在實際運作中，卻造成地方官吏和商賈爭利的惡果，商賈活動幾近於停息。詩中寫道，本是忙碌的白天，卻「城門晝閉」。百姓安居樂業，本應該是吏事的重心，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豈如不蒙斧斤賞，老大絕崖霜雪間」句，化用「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²¹ 的意思，意謂假如用人得當，不愁無可用之資。但是，官員塞責，不思有為，上諫言者反而蒙受「斧斤之禍」，²² 於是產生不如老於荒山、碌碌無為以盡天年的思想，這裏暗用《莊子》「無用而大用」²³ 的典故。凡此，可見黃庭堅「以才學為詩」的特色。詩歌內涵可堪吟詠，但乏強諫的議政之風。

四. 緊扣政事而呈晦澀難解

黃庭堅對詩法的探討下過一番苦功。其〈答洪駒父書〉云：

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始終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

……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²⁴

20.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3，頁825-827。

2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梁惠王上〉，頁203。

2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告子上〉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苦彼濯濯也。」頁330。

23. 莊子著，孫海通譯注：《莊子·逍遙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有載：「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內篇，頁17-18。

24.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頁474-475。

前段概述多讀書的好處，認為作文「『皆須』有宗有趣」，有源有始；後段調杜甫和韓愈的詩句「無一字無來處」，強調讀書的重要性。又云：

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²⁵

其所推崇的是「不煩繩削而自合」、「更無斧鑿痕」的詩歌，即「天然去雕琢」，簡易而能達到「大巧」、平淡而能見乎「高」「深」的境界。「好作奇語」之弊他頗有認識，認為歐蘇等人沒有此毛病，尤其能較客觀地對於王安石詩歌作出肯定，更見其不因人廢詩的心胸。但是，應該指出，黃庭堅在具體創作實踐中，並未能完美地達到設想的由「技」而進乎「道」的境界，又由於政治上的遭遇所促動和理學的影響，²⁶ 致使他轉而把過多精力花在學問和參禪方面，其涉及論政的詩歌，詩風亦出現深晦難解的毛病。

元豐五年（1082）所寫〈二月二日曉夢會於廬陵西齋作寄陳適用〉和〈上大蒙籠〉有關賦鹽政策的兩首詩，也突顯黃詩緊扣時事的特色，但已呈晦澀特徵，時乃烏台詩案發生兩年後，雖然黃庭堅並沒有如蘇軾受到牢獄之災，但精神上亦備受困擾，詩風有一定的變化，直至貶黔州後，詩歌轉向更為清晰。試見詩中所云：

燕寢著爐香，愔愔閉窗聞。夢到郡城東，笑談西齋月。
行樂未渠央，苦遭晴鳩聒。江郡梅李白，士女嬉城闕。
聞道潘河陽，滿城花秀髮。頗留載酒車，共醉生塵襪。
想見舞餘姿，風枝斜蠶髮。鄙夫不舉酒，春事亦可悅。
雨足肥菌芝，沙暄饒筍蕨。海牛壓風簾，野飯熏僧鉢。
飽食愧公家，曾無助毫末。勸鹽推新令，王欲憚獨活。
此邦淡食儉，儉陋深刺骨。公困積丘山，賈豎但圭撮。
縣官思乳哺，下吏用鞭撻。正恐利一源，未塞兔三窟。
寄聲賢令尹，何道補黥劓。從來無研桑，顧影愧簪笏。
何顏課殿上，解綬行采葛。²⁷

黃霧冥冥小石門，苔衣草路無人跡。
苦竹參天大石門，虎迹兔蹊聊倚息。
陰風搜林山鬼嘯，千丈寒藤繞崩石。
清風源裏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
向來陸梁嫚官府，試呼使前問其故。

25.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頁470-471。

26. 參閱福玲：〈宋代理學與宋代文學創作〉，載張高評編：《宋詩綜論叢編》（高雄：麗文文化事業，1993年），頁609-626。

27.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4冊，卷10，頁1097-1099。

衣冠漢儀民父子，吏曹擾之至如此。
窮鄉有米無食鹽，今日有田無米食。
但願官清不愛錢，長養兒孫聽驅使。²⁸

論其詩風，因為所指之事皆為實處，詩顯得質實，而乏輕靈之態，讀來亦有點拗口。誠然，詩歌關切時事是值得推許的，但如何把「質實」的詩材入詩而使詩歌不至於徒具詩的形式並不容易。北宋中期以後，詩歌的散文化、議論化已很突出，又加上以學問為詩等詩法的漸成，宋詩新變的客觀條件複雜多了，如何在一首作品中不失美感而又具政治內涵不是容易的事。對於這兩首詩而言，因為主旨明確，不求之考證的材料還能曉以用字用意的內涵。但如下引的〈己未過太湖僧寺得宗汝為書寄山贛白酒長韻詩寄答〉，就較難了，試細讀其詩：

從學晚聞道，謀官無見功。早衰觀水鑒，內熱愧鄰邦。
比鄰有宗侯，治劇乃雍容。摩手撫鰥寡，蒿礎磔強梁。
桃李與荊棘，稱物施露霜。政經甚縝密，私不蚍蜉通。
……

一錢氣不直，白挺及父兄。簪筆懷三尺，揖我謂我臧。
向來豪傑吏，治之以牛羊。我不忍敵民，教養如兒甥。
荊雞伏鵠卵，久望羽翼成。訟端洶洶來，諭去稍聽從。
尚餘租庸調，歲歲稽法程。按圖索家資，四壁達牖窗。
揜目鞭撲之，桁楊相推搡。身欲免官去，駑馬戀豆糠。
……

味溫頗宜人，芼以石飴薑。舉杯引藥糜，詠詩對寒江。
寄聲甚勞苦，相思秋月明。我邑萬戶鄉，其民資罷凶。
欲割以壽公，使之承化光。反以來壽我，中有吞舟鯨。
銅墨俱王命，職思慰孤惻。何時賭一擲，燒燭咒明瓊。
…… 29

這首詩的詩意有點費解，這裏不打算細究其句意，純從寫作技法而言，其用字用句，都間流露出「好奇尚硬」、「點鐵成金」的追求，隨意所見，有些字句更是生僻罕見，人工痕跡明顯。當然從另一面來說，亦說明黃庭堅讀書甚博。詩本講究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但這首詩給人以相對凝滯的感覺。北宋後期的很多傾向於以才學為詩的詩歌，事實上和普羅讀者的認知能力是越離越遠。筆者曾作過比擬，北宋詞到周邦彥之時，先後經「元豐被眷」、「元祐被貶」、「紹述漸隆」、「清真寡欲」的四個階段，³⁰ 其詞風

28.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4冊，卷10，頁1125-1126。

29.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4冊，卷11，頁1131-1134。

30. 參沈松勤：《詞家之冠一周邦彥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至第四章。

最終走向典雅化及格律化，下句用字，皆有法度，呈人力勝天工之貌，這涉及的因素當然相當複雜，但詩詞技藝的突出進展先後出現於此一時期，政局的變化對創作主體造成的磨難，致使他們把注意力轉移，應是共同的因素之一。

元祐元年（1086），黃庭堅曾作有〈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兩首六言詩，其一謂：

風急啼鳥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³¹

此詩借寫景寓意新舊黨爭，首兩句寫眼前景，藉風雨欲來之際、蟻蟲爭穴而居的情景，暗寓政治風波險惡；兩句看似平平無奇，卻嵌用了《述征記》「銅烏觀風」及《易林·震之騫》「蟻蟲爭穴」典故，化用而了無痕跡，殊為可貴；後兩句平白如話，卻蘊含豐富哲理，用《莊子·齊物論》「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³² 意謂是非顛倒，黑白不分。

又見〈同堯民遊靈源廟廖獻臣置酒用馬陵二字賦詩〉其一云：

靈源廟前木，我昔見拱把。七年身屢到，鬱鬱蔭簷瓦。
春風響馬銜，並轡客瀟灑。更願少尹賢，置酒意傾寫。
齋堂有佳處，花柳輕姪姘。蓮塘想舊葉，稻畦識枯苴。
開關撫洪河，黃流極天瀉。憶昔武皇來，系壁沈白馬。
從官親土石，繼負至鰥寡。空餘瓠子詩，哀怨逼騷雅。
白圭自聖禹，今誰定真假。晁子發讜言，聖功諒難亞。
排河著地中，勢必千里下。移民就寬閑，何地不耕稼。
此論似太高，吾亦茫取捨。有器可深川，吾未之學也。³³

此詩作於紹聖元年（1094），題目所示，乃黃庭堅遊靈源廟所作，詩中對於朝廷推行的農田水利法提出批評。據《宋史》載：「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³⁴ 當知此詩直接諷刺王安石以鐵龍爪疏治河道的政策之不是。詩以景起，次述武帝傾力治河無功而還，徒剩作〈瓠子詩〉以賦其情，詩人借此典故諷喻神宗「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最後再言其結果，由於治不得法，「勢必千里下」，氾濫成災。此詩抨擊時弊，寫得嶄硬但並不激怒，當時黃庭堅年屆五十，詩風已顯出老成之貌。其用字用句正朝著「無一字無來歷」的方向進展，散文化的特色消退，因而讀來有點費解，說明在烏台詩案後、貶黔州前，其詩風已呈深晦的特色。

又其第二首云：

31.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1冊，卷3，頁146。

32. 莊子著，孫海通譯注：《莊子》，內篇，頁31。

33.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6，頁937-938。

34. 脫脫：《宋史·黃庭堅傳》，第37冊，卷444，頁13109。

洪河壯觀遊，太府佳友朋。春色挽我出，東風如引繩。
昏昏版築氣，王事始繁興。大堤如連山，小堤如岡陵。
增卑更培薄，萬杵何登登。憶昨河失道，平原魚可罾。
田菜人未復，瘡大國方懲。忽念未耜閑，為民保丘塍。
百縣伐礬出，夜半廢曲肱。吾儕愧祿廩，遊行事鞍乘。
晁子漢公孫，新去司馬丞。出幹大農部，才術見嗟稱。
我坐廣文舍，七年讀書燈。結髮入場屋，肯謂河難憑。
爾來觸事短，癡甚霜前蠅。世味極淡薄，不了人愛憎。
惟得一卮酒，尚能別淄澠。所以對樽俎，未曾聞斗升。
酌我良已多，狂言恐侵陵。暮雲吞落日，歸鳥求其朋。
冷官僕馬瘦，及門鼓騰騰。³⁵

此詩比諸第一首流暢，詩夾有敘述、評論、抒情，對於治河政策加重人民的勞役有詳盡的描畫，抒情則沒有激蕩之態，對於世態炎涼似乎了然於胸。詩中表達了黃庭堅對「冷官」作諫的功效有所保留，及對統治者流露出一不滿之情，但還未至於有怨怒的情緒。黃庭堅對於蘇軾因「怒鄰罵坐」而惹詩禍是有所認識的，曾不客氣批評蘇詩這方面的缺點。其詩風和蘇軾呈外放式的風格有異，這和黃庭堅對於政治現實的認識是有密切關係的。

黃庭堅的詩歌不單關注內政，對於外交，亦有所著墨，但也呈隱晦特色。〈和謝定公河朔謾成〉其三曰：

直令南粵還歸帝，誰謂匈奴不敢王。
願見推財多葡式，未須算賦似桑羊。³⁶

澶淵之盟是真宗皇帝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求和的結果，盟約訂立後，宋室一直以被動的狀態屈辱於遼國，熙寧八年（1075），為了牽制西夏，神宗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割地與遼，黃庭堅此詩即針對此問題，指出這種行徑只會助長敵方意氣，並非良策。他引用漢朝卜式（生卒年不詳）散家財以救國家抗外夷的典故，說明王安石此舉不能模擬；轉而言免役錢等新法，用漢代桑弘羊（前152-前80）以鹽、鐵為國營的史事，指出此舉雖為國庫帶來收入，但終歸卻只備漢武帝開拓疆土之用，對民生無甚益處。詩的後二句各用一典，諷喻時局，但不直說，讀者需細細推究。「推財」「算賦」用字又見其「點鐵成金」的努力。又見其七：

蛛蒙黃畫屏初暗，塵澀金門鎖不聞。
六十餘年望瑯輦，赭袍曾是映宮槐。³⁷

35.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6，頁939-940。

36.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4，頁863。

37.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4，頁865。

及其八：

百里棄疆王自直，萬金捐費物皆春。
須今牧馬甘踰幕，更遣彎弓不射人。³⁸

都反映出相同的特色。

五. 不怨不怒到參禪悟道

從不怨不怒到參禪悟道的轉向，其中一個促動原因，亦乃因為經歷政治風波，其詩歌作品主題變得極少正面直涉政治，詩藝上則更專注於詩法的探討。其詩歌中以佛釋自遣的痕跡也變得明顯，這和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轉變很類似，亦說明北宋中後期，隨著黨爭的加劇，政治變化給詩人的打擊促使詩風的轉向乃其中一個普遍規律。

黃庭堅有詩〈寂住閣〉云：

莊周夢為蝴蝶，蝴蝶不知莊周。
當處出生隨意，急流水上不流。³⁹

此兩詩寫於新黨推治「神宗實錄案」後，時黃庭堅待罪畿縣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陳留鎮），取寓居的二閣名為「寂住」、「深明」，這是其中一首，借述己懷。詩用「莊周化蝶」典故和佛釋「相實」的思辨，寓意物我同化，隨緣處世。黃庭堅以不變觀之，明白到物理恒常，物相的短暫變化只是皮相之象，無需介懷。詩表現出詩人的澹定、冷靜，抒情中充滿理趣。

又其〈夢李白誦竹枝詞三疊〉云：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
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

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
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

命輕人鮮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
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⁴⁰

詩寫於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後，此時的黃庭堅，歷經政治坎坷，心中難免產生痛苦之情。詩歌以抒情為主，但寫得「抑鬱頓挫」，頗具悲苦之思，如從黃庭堅的不怨不怒詩論觀之，則又說明其理論和創作間中也存在差距。這亦側面說明初遇政治風波後的詩人心境畢竟難以平衡，起伏不定。移黔州後，無奈之中，詩人發出感喟：

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⁴¹

38.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外集》，第3冊，卷4，頁865-866。

39.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1，頁418。

40.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2，頁421-423。

41.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2，〈謫居黔南十首〉之五，頁444。

〈用前韻謝子舟為予作風雨竹〉有句云：

吾聞絕一源，戰勝自十倍。榮枯轉時機，生死付交態。⁴²

從中又見黃庭堅抱道而居的處世態度。

又見其〈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二首〉：

萬事同一機，多慮乃禪病。排悶有新詩，忘蹄出兔徑。
蓮花生淤泥，可見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與晚色靜。⁴³

主人心安樂，花竹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
斫枯蟻改穴，掃箨筍迸地。萬籟寂中生，乃知風雨至。⁴⁴

詩作於哲宗元符二年（1099），時黃庭堅貶於黔州。寫出一位歷經政治風波的老者看通世事物理。行文中頗見「以才學為詩」的特色，除了用《楞嚴經》及《傳燈錄》典以說明多慮多失、不如守一的哲理外，復以「蓮花」象徵，意指萬物本無分別，優劣皆出一轍。末句「晚色」更語帶雙關，一指黃昏，一指自己的心境，頗堪玩味。第二首頗有杜甫詩「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意趣：謂如果能靜心觀物變，順道娛情，必能得物外真趣。萬物正是在人們不經意的寂靜中茁壯生長。也就是說，天地無言，下自成蹊，緣生而滅，乃自然之道。「斫枯蟻改穴，掃箨筍迸地」句，在用字選材方面有點突兀，和整首詩的淡然顯得有點不協調；但從理趣方面言，又成了矛盾的統一，這也是黃庭堅詩的一大特徵。此兩詩涉理趣、抒情，而去散文化，是黃庭堅具「詩味」的典型作品。其詩風有似王維，但奇崛瘦硬又和王維大異其趣。其深刻的內涵在黃庭堅早期的作品中不曾多見，當中除受理學影響外，政治生涯的驟變是其中一個分野的關鍵。

又〈顏徒貧樂齋二首〉云：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旁無給侍，百衲自纏裹。
論事直如弦，觀書曲肱臥。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⁴⁵

小山作友朋，義重子與桑。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妝。
烏鳥窺凍硯，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樑。⁴⁶

徽宗崇寧二年（1103），黃庭堅因作〈承天院塔記〉，被羅織「幸災謗國」罪名，貶至宜州，蘇門四學士與三蘇文集悉被焚毀。⁴⁷ 歷經多番政治升降的黃庭堅，其心境極為平靜。以讀書為樂，儘管無炊米可煮，依然浩歌自得，守道自足。晚年詩風「奪胎換

42.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2，頁453-454。

43.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3，頁459。

44.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3，頁460。

45.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8，頁634。

46.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8，頁635。

47. 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崇寧二年四月乙亥條，卷21，頁741。

骨」、澹然天成，思想性強，和中年的刻意而為截然不同，而與其「不煩繩削而自合」、「更無斧鑿痕」的詩學觀是一致的。這種排遣情懷的方式實質上是一種在政治現實下無可奈何的辦法，北宋詩人在貶謫生活中亦流露出歸隱的念頭，但除初期的晚唐派詩人外，真正退出政壇而歸隱的詩人少之又少，其一生在政治進退之間浮沉的詩佔大多數，而釋、道和儒家思想的互補格局正好為其提供一個精神上的避難之所。詩人在歷經政治變化後，往往將其注意力轉向，促使其詩風出現內涵和風格上的新變，紹聖前黃庭堅認為詩歌論政應該溫柔敦厚，經烏台詩案的有驚無險和修史罹禍後，更堅定了這看法。

又見〈次韻楊明叔見錢十首〉其九云：

松柏生澗壑，坐閱草木秋。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
骯髒自骯髒，伊優自伊優。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⁴⁸

和〈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東來數百觴。
喚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秧稻午風涼。
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
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猶夢遶羊腸。⁴⁹

詩的內容淺顯易明，風格悠然淡雅，去盡蕪華。今人蕭慶偉評謂：「不作奇語，不事雕琢，而致思高遠，已入平淡而山高水深之境。」⁵⁰道出黃庭堅的詩境變化。

黃庭堅在〈與王觀復書〉其二所云的「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無斧鑿痕」之境⁵¹可作為紹聖以後其詩風的最佳注腳。其發展和黃庭堅熙寧、元豐、元祐年間詩歌的「用語生硬」、「雕琢功多」貌似背道而馳，事實上亦乃一內在的發展邏輯，這其中，政治因素的促動不可忽視。

世人論其詩，批評其流於「形式主義」，短於言情、艱澀難懂，徒得杜詩韓詩的皮毛而沒有繼承其現實主義精神，其實是很難一概而論的，要分開不同時期來加以審視。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二十二嘗評謂：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⁵²

古今學人對此詩的解釋不盡一致，鄧昭祺對此進行了詳盡的箋證，認為清人鄭獻甫對本詩的解釋最為簡明扼要：「首二句言江西社之毛病，第三句還山谷詩之本領，第四句言自己之倔強。語本明順，毋庸解釋。」⁵³又謂：「遺山的『一波纔動萬波隨』，卻是用

48.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4，頁501。

49. 黃庭堅著，任淵注：《黃庭堅詩集注》，第2冊，卷16，頁593-594。

50. 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279。

51. 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頁470-471。

52. 元好問著，施國祁注：《元遺山詩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頁531。

53. 元好問著，郭紹虞箋：《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83。

來象徵一呼百應、風起雲湧地跟隨別人的作詩風氣。」⁵⁴ 對於黃庭堅詩之「奇」的得失參半，這裏不煩多言，純從詩藝層面而言，山谷詩之「本領」在宋代詩人中誠乃最為突出之一，其人則呈一代詩宗的主盟角色，詩到蘇黃時代雖不可謂「盡」，但誠如《後村詩話》謂：「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⁵⁵ 卻也接近詩壇的實況。至如《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二所載：

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敘〉而言。〈敘〉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唯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復，盡兼眾體。」⁵⁶

曰「一人而已矣」、「盡兼眾體」又未免揚之太過（按：關於古代詩話、牌文、吊辭等有關詩評的內容，雖具資料價值，往往帶有主觀性，尤其是後兩者，交情、奉敕等因素發揮很重要的影響，因而當引用這些資料時，還需加以鑒別。）評論較為中肯而具有詩史史識者，則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所云：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⁵⁷

黃庭堅的詩學詩藝成就俱高，北宋以後，影響深遠。但過份追求詩法，走上斧鑿痕跡太深的詩路，追究其中原因，不能忽視政治直接或間接促成的關係。同時，亦不能忽視，「宋詩的轉變，除了是刻意的掙破傳統，偏離唐詩，求取創新外，還受到理學發達的影響。」⁵⁸ 愈到後期，尤其是在黃庭堅等江西詩人的身上，影響愈益明顯。

六. 結語

作為一位典型的儒士型、政治型的詩人，黃庭堅表現出與王禹偁、范仲淹以來一脈相承的積極參政精神，其詩歌涉及範圍亦廣，內政外交皆有識見，批評王安石新法亦能切中要害，但對新法的諷諫，雖有激越不平的情緒，總體上則表現出敦厚穩健的詩風。烏台詩案後至被貶黔州前，乃其詩風轉變的緩衝期，詩風已呈奇崛瘦硬，用字用句朝著「無一字無來歷」的方向進展，散文化特色消退，詩風呈深晦的特色。詩寫得崛硬但並不激怒，由於好用典故，不易解讀，其直接論政的力度有所減弱。

54. 鄧昭祺：《元遺山論詩絕句箋證》（香港：當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295。

55. 劉克莊：《後村詩話》（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1冊），卷2，頁7。

56. 胡子：《漁隱叢話·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0冊），卷32，頁13。

57.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載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冊，頁688。

58. 吳淑鈿：《陳與義詩歌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一章，〈緒論〉，頁1。

隨著黨爭的加劇，政治變化成為詩風轉向的一個原因。三教思想的盛行，又為其詩歌提供援道說禪的契機。其後期詩歌主題變得極少正面直涉政治，於詩藝上則更專注於詩法的探討，其中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化俗為雅」、「無一字無來處」等主張，影響深遠。其詩歌中以佛道自遣的痕跡也變得明顯，這和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轉變很類似，呈現出儒家安貧樂道、道家瀟灑放曠、佛家隨緣而安的思想特色。晚年對政治呈冷感狀態，詩歌自抒性情以排遣情懷，「奪胎換骨」、「不煩繩削而自合」、「更無斧鑿痕」，和前期的刻意呈兩極化。

黃庭堅卒於崇寧四年（1105），崇寧元年（1102）後的全面文禁，對其詩歌創作造成的影響有限，故其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現實。黃庭堅今存詩1338首，其中108首政治詩，佔百分之八，絕對數不多，但於江西詩人群中已算是最為突出的，在時人普遍「諱言詩」的北宋後期，可說明政治詩禁而未絕。然而，從江西詩人群的總體作品量觀之，北宋政治詩的創作至此時期顯然給人以日薄西山的印象。 □